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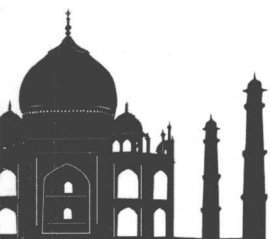
Awakening Giants, Feet of Clay

Assessing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觉醒的泥足巨人 中印经济崛起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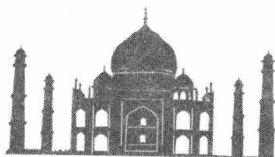
普拉纳布·巴丹◎著
(Pranab Bardhan)

陈青蓝 杨 震 许宇萱◎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Awakening Giants,
Feet of Clay*

Assessing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觉醒的泥足巨人

中印经济崛起评估

普拉纳布·巴丹◎著
(Pranab Bardhan)

陈青蓝 杨震 许宇雷◎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觉醒的泥足巨人 / (印) 巴丹著; 陈青蓝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8

书名原文: Awakening Giants, Feet of Clay

ISBN 978-7-5086-3453-1

I. ①觉… II. ①巴… ②陈… III. ①经济发展-对比研究-中国、印度 ②社会发展-对比研究-中国、印度 IV. ①F124 ②F13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7539 号

Awakening Giants, Feet of Clay: Assessing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by Pranab K. Bardhan

Copyright © 2010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ALL RIGHTS RESERVED

觉醒的泥足巨人

JUEXING DE NIZU JUREN

著 者: [印] 普拉纳布·巴丹

译 者: 陈青蓝 杨 震 许宇董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483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453-1/F·268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总 序

作

为 CIDEГ 文库的主编，我们首先要说明编纂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CIDEГ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的英文简称，成立于2005年9月的CIDEГ，得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而且，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和企业界。我们希望把 CIDEГ 办成类似斯坦福大学非常著名的公共经济政策研究中心（Stanfo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IEPR）那样，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和政策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在深层知识的产生上发挥作用。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政府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

中的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定位和边界至关重要。CIDEG 的目标是致力于“制度变革与协调发展”、“资源与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组织、监管及政策”为重点的研究活动，为的是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及教育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学习和协调。

在 2005 年 9 月 28 日 CIDEG 召开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与环境”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正是中国当今的产业和环境状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 28 年历程，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当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不过，中国今后是否可持续增长，却是世界上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源约束和环境制约，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糟糕的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足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来自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正是 CIDEG 将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刚刚发布的“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对发展模式的调整，号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也为 CIDEG 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更有利的前景。

而中国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显然刚刚开始，中国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最近《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建立一个排放权的市场是否对控制尾气排放有效？如何资助新环境技术

的进步？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经济学素养。而建立一个环境监管体系，就不仅涉及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更需要对广泛社会问题的考量。环境污染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成本 and 价值的重新分配问题，因而要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考虑环境监管。并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环境污染的源头在发生改变，监管体系也就应该随之改变。

还有公共卫生问题，比如 SARS、疟疾、艾滋病等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传播，如何控制这些病的流行，不仅需要医生的合作，而且涉及许多移民的工作、生活和环境等问题。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法要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就要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是独特的。但是，由于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有些研究需要与过去同是计划经济的中欧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较。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开始阶段农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传统社会规则是农业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生发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发展形式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很不一样，也与俄罗斯等国不太一样。所以，在面对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独特性的问题时，比较研究会很有意思。虽然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国家学到许多经验。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与环境的冲突方面，我们可以从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环境立法、产业发展协调中学到许多教训和经验。所以，对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比较经济制度分析是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会融合，可能会继续保持差异。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政策不一

定是普世适用的，在某些国家可能容易实施，其他国家也许不行，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收集和整理这些成果以作进一步的交流，是十分可取的途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较、借鉴和学习也成为 CIDEG 学术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 CIDEG 理事长陈清泰的倡议，我们决定翻译并出版这套“CIDEG 文库”，介绍不同国家是怎样从农业国发展为现代国家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是如何处理与环境的矛盾的。这套丛书的内容选择非常宽泛，从学术的到非学术的都在其内，目的就是给中国的读者——学生、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以及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CIDEG 理事和学术委员为文库提供了第一批书目，并成立了编委会，今后我们还会陆续选择适当的图书编入文库。为此，我们感谢提供出版书目的 CIDEG 理事和学术委员，以及入选书籍的作者、译者和编辑们。

青木昌彦

吴敬琏

2006 年 4 月 10 日

前 言

这本小书是关于中印两个大国的，主要是比较这两个国家在过去 25 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本书不是要谈论它们目前对全球经济的重要影响，尽管这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而更多的是要讨论两国国民的实际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变化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我们也不想谈论当前的经济衰退所产生的影响，而是聚焦于长期的制度和政治经济问题。本书并非最前沿的研究，而是对现有信息和研究成果的引用。本书力图避免理论分析或经验分析的细节，而是面对大众读者，以比较政治经济学方法，粗线条地、相对连贯地勾画出有关这两个国家的总体轮廓。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本书也去除了有关这两个国家经济成就斐然的一些神话，而这些神话在媒体和部分学者中广为流传。

感谢塔朗·卡纳（Tarun Khanna）、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以及对本书草稿提供有益评论的两位审稿人。

普拉纳布·巴丹于伯克利

2009 年 4 月

Awakening Giants

目 录

总 序	V
前 言	IX
第一章 引言：环绕巨人的迷雾	1
第二章 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不同的模式与制度	18
第三章 农业：仍然是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	41
第四章 基础设施：惊人的差异	52
第五章 高储蓄、低金融中介	62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兴起	74
第七章 贫困和不平等：如何分享增长成果？	84
第八章 社会部门：与社会主义遗产的关系	97
第九章 环境：警报正在拉响	108
第十章 展望未来：透过政治经济的棱镜	115
参考文献	145

第一章 引言：环绕巨人的迷雾

……我已深知

无论何处，皆可为家。

——马来裔诗人吴宝星《宛如神爱我们》

过去几年中，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对中国和印度在国际经济中的崛起兴奋不已，对两国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中相对出色的表现更是兴趣盎然。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相对停滞，这两个总人口占世界人口近 2/5 的国家在过去 25 年左右的时间里，国民收入达到了相当高的增长率。在 1820 年，这两个国家贡献了全世界经济收入的将近一半；在 1950 年它们的份额低于 1/10；目前，它们的份额大约是 1/5；而到 2025 年它们的份额将会达到 1/3。^①

按照国际价格计算，在 1870 年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印度的人均收入水

^① 这些数字是 Maddison (2007) 估算的。他的收入估算均以 1990 年国际价格为准。我们也可以根据世界银行新的购买力平价数字，修订这些估算。

平略微领先于中国，但是从那以后，尤其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远远超过了印度。在过去 20 年中，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是 4% 左右。中国增长速度则是印度的两倍，即便剔除中国官方经济增长数字的夸大成分，中国的增长仍然明显快于印度。在全球制造业贸易中，中国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在全球服务业贸易中，印度也取得了同样的进步，这样的进步引起了富裕国家的工人和专业人士的不安（这一点还有待证实）。在它们自身的巨大国内市场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的同时，发源于这两个国家的全球化企业也开始展示其实力，在西方市场上收购企业。记者们常常用各种形象的比喻，如巨人摆脱“社会主义迷梦”、“笼中虎”挣脱锁链等，来描述这两个大国的经济改革和全球化进程。报纸专栏作家和媒体人们从北京和班加罗尔发来令人屏息的报道，描述在一个“扁平化”、全球化的竞技场中，两个新秀即将给迄今为止仍自我感觉良好的国际社会带来残酷的竞争。还有人警告，随着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的“30 亿新生资本家”的出现，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将被重新定义^①。

尽管我认为，对中印两国的发展进程和富裕国家可能面临的困难所作的描述，有夸张的成分，但本书并不打算就中印崛起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经济或地缘政治挑战，做多余的研究，而是打算更多地深入到这两个国家内部，对它们的经济成就和仍然存在的大量问题进行比较，重点是中印国内政治经济背景下的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我还打算少关注一些政策，多了解一些在这两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变化又是在什么约束条件下发生的。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不会将重点放在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上（比如天天见诸报端的有关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货币和汇率问题、经济周期、国际

^① 具体内容见 Friedman (2005)、Prestowitz (2005)。

投资恐慌撤离、贸易信用收缩，或者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内外冲击采取经济刺激政策或经济调整，等等），而会把更多的篇幅放在长期的趋势和问题上。虽然这两个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我会更多地关注它们在过去 25 年中所发生的事情。

显然，限于篇幅，这本小书不可能对每个问题都说得很深入，但是我将尽量避免对这两个经济体作过于简单化的描述，而在当前的很多评论中，不乏这样的描述，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民主或威权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讨论。在结语篇中，我将就这个问题在中国和印度的复杂性作一些探讨。另一个备受关注的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增长率；除了谈到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估算有关的问题之外，我们将超越国民收入增长，更深入地剖析政治经济力量，尤其是那些与收入分配冲突有关的因素。在这两个国家，这样的冲突常常在社会表象之下孕育和发酵。近年来，我看到了很多有关这两个经济体的溢美之词，但大多流于泛泛之论，这使我想起亨利·詹姆斯 1909 年在《卡萨玛西玛公主》一书前言中写的一段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对浮华世界背后的暗流涌动，极力视而不见”。

许多年以前，我在德里经济学院任教。有一次，我的朋友兼同事，已故的达赫马·库玛尔问我，如果不考虑显而易见的文化上的局限（比如我不懂中文），我有机会选择生活在印度或中国，我会怎么选择。我想我当时的答案让他很失望，我说如果我是穷人，就宁愿生活在中国。今天，我对我的答案不再那么肯定了，尽管与当时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相比，现在的中国穷人在物质生活上比印度穷人还要好得多。今天我觉得我的答案也许就在这一章开头引用的吴宝星的诗句当中，尽管这样的回答有些闪烁其词。

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大约 100 年之前，1947 年印度独立的大约 200 年之前，这两个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经历了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悲痛遭遇。

至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停滞和相对衰落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个时期的遭遇相关，历史学家们仍有争议。然而，今天没有争议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它们在很短的时间里（25 年多一点）部分恢复在世界经济中曾经拥有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史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人们常常用一套简单的泛泛之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这样的解释似乎已经成为传统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下面两段话就是这种泛泛之论的一个反映。

数十年的社会主义控制和管制窒息了企业的发展，让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走入了死胡同。它们当前的市场化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最终释放了它们的创造力。它们积极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由此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大量贫困人口脱离了贫困。现在，这两个国家充斥着上十亿“新生资本家”，他们正在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印度在这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但在中国耀眼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面前，显得黯然失色。中国目前已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中国工业在过去 25 年实现了爆炸式增长，这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甚至超越了早先的“东亚奇迹”。就像其他“奇迹”一样，中国被认为是另一个“发展型国家”的成功案例，有积极的产业政策以及由国家投资与引导的工业化计划。

中国的经济表现好于印度，这表明在发展的早期，威权体制也许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正如我们在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所看到的那样。然而，就中国而言，经济上的地方分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权力下放，使地方上的人们享有更多自治和激励，即便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它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地方经济发展（不像在俄罗斯，地方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和寡头的勾结合谋，直到普京政府上台，这种现象才有所遏制）。然而，全球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比印度严

重，这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中国没法像民主印度那样，能够释放人们因不满贫富分化而带来的压力。但是，中国并非没有民主的希望。随着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他们将逐渐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并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这种趋势是确定无疑的，就像在韩国和中国台湾曾经经历的那样。

当然，上述说法有其真实性，经过反复宣扬，还获得了某种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经不起更严谨的推敲。本书相当大的篇幅将对这种过于简化的说法提出质疑。

首先从两个相对细微处着眼，来讨论中国的工业增长。从产量来说，中国也许是很多种商品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但从增加值来说并非如此。和大众的印象相反，全世界制造业的增加值中，日本或美国所占的份额仍然远远高于中国，其份额均超过中国的两倍。同样，尽管中国的工业产值增长率高得惊人，但是它的增长速度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第二章的图 2.1 比较了中国在经济加速增长的第一个 25 年中（从 1978 年开始），第二产业（制造业、采矿业、消费品生产、建筑业）增加值增长率与其他三个东亚经济体经济起飞期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这三个东亚经济体分别是：日本（从 1955 年开始）、中国台湾（从 1960 年开始）和韩国（从 1965 年开始）。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增长超过了日本，但是低于其他两个经济体。当然，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其工业增长相比于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工业增长，显得更加可观，也更不可比。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反复被人提及的观点：正是融入全球经济带来了中印两国的高经济增长，并大幅度降低了困扰这两个国家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之久的绝对贫困程度。首先，和通常流行的印象相反，中国的经

经济增长主要并不是出口带来的。我在第二章中将谈到，就经济增长而言，与国内投资和消费相比，1990~2005年中国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实并不显著。其次，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的进步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之后的10年；而在取得这种进步之前的1978~1993年，中国仍然达到了年均9%的高增长率。正如我将在第二章和第七章中所讨论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高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率大幅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内部因素，而不是全球化。这些内部因素包括农业组织方式的制度性变革，这个产业集中了最大量的贫困人口；土地耕作权的平均分配，为农村获取收入的机会平等奠定了基础，因此有利于减贫。即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仍有大量证据表明，教育、农业研发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公共投入，仍然是中国农村减贫的重要因素。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扩张，在过去十几年中令很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印度则并非如此，印度的出口产业仍然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同样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是，经济改革是不是近年来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改革无疑使印度的企业部门更灵活、更具竞争力，但是，印度经济的大部分并不在企业部门，94%的劳动力并没有在企业部门工作，无论是在公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让我们看看快速增长的服务业，印度的信息服务业赢得了世界赞誉，却只雇用了印度劳动力的不到0.5%。在服务业中，改革可能产生显著影响的金融、商业服务（包括IT服务）以及通信业，只占服务业总产值的大约1/4。服务业产值中的2/3是传统的或者是“无组织的”商业活动和不在政策覆盖范围内的微型企业，政府的监管政策和外贸政策改革很难对这类商业活动或企业有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印度经济中的公司部门已经从整顿庞大的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改革中受益。

关于印度的贫困问题，全国家庭调查数据显示，与20世纪70年代和80

年代相比，在经济密集开放的 1993 ~ 2005 年，减贫速度并没有加快，与贫困率有关的非收入指标，如儿童健康指标，近年来鲜有改善，尽管这个指标已经很糟糕了。大多数贫困人口所在的农业生产部门，增长率在过去 10 年中不升反降，主要是因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减少了，而这和全球化基本无关。另外，那些预期中国和印度将出现“上十亿新生资本家”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两个国家，有上亿贫困人口至今仍然在生产能力极度低下的小型家庭作坊里艰难谋生，而他们无法获得信贷、也没有市场和基础设施，更不具备基本技能、教育以及风险承担能力，以便从事资本主义生产。他们仍处于这种状态，是因为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分（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无法吸收他们。

这并不是说经济改革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中印两国不重要，或者说近些年来两国并没有发挥其创造力。我只是恳切地希望，人们能够更多地关注市场中各种结构性力量复杂的相互作用对穷人生活的有利或不利影响。

在财经媒体的报道中，中国和印度俨然成为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榜样。在私有化、产权和放松管制的经济政策以及拖拉僵化的官僚制度方面，这两个国家明显偏离了正统经济学。然而，这并没有逃过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法眼”。看看被广泛引用的传统基金会发布的 2008 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国和印度的排名相当低；在 157 个国家当中，中国排名第 126 位，而印度排名第 115 位，这两个国家都被归入“最不自由”的国家行列，它们的排名比很多“中等自由”的中南美洲国家还要糟糕得多。当然，很少有人指出这两个在经济自由度上“最不自由”的国家，其经济表现看上去要比大多数其他国家好很多。

中国和印度都曾有一段时期实行社会主义控制和管制，抑制了人们的积

极性和进取心^①，尽管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否认那个时期的正面遗产则有失公允^②，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近年来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下所取得的经济增长。

可以说，中国早先的社会主义时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为工人提供了坚实的最低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广泛的教育和医疗卫生）；
- 快速增长的农村电气化推动农产品加工和农村工业化的增长；
- 高度平均主义的土地再分配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农村社会安全网，因此，即使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各种阵痛，但初期的改革进程仍推进得比较顺利；
- 地方经济分权体制（共产党官员的升迁与地方经济表现紧密相关），例如，早在经济改革启动之前，县政府就要负责企业的生产，因此积累了大量的制造业方面的经验、技能和网络；利用这些优势，改革前公社体制中的生产大队非常成功地演变为乡镇企业，开启了惊人的农村工业化；
- 建立了全国性的基础科研和技术革新体系（即使是在1980年，研发的投入占GDP的比例也高于绝大多数穷国）；

① 有人认为，除了在政治语言之外，改革之前的印度奉行的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这里我们暂且不论社会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之间的共性（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基本上属于官僚国家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② 这份遗产常常被否认，而否认它的不仅仅是西方的评论者，中国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们（比如汪晖），在哀叹中国意识形态争论式微的时候评论道，在很多中国人的头脑中，20世纪实际上已浓缩成最后的20年。